

都是資本主義惹的禍!?： 論資本主義的是非、功過與改革之道

鍾世靜、朱美智、吳黃蘋

摘要

「資本主義」一詞意指一種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中，資本為私人擁有並交易；資本的所有者判斷資本的最佳用途，在做出判斷時，他們可以參考企業家與創新思想家的眼光和創新思維。

如今，資本主義制度遭到曲解。那些對資本主義最感深惡痛絕的人士，對「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與「自由市場」（free markets）發生混淆。當政府領導人士常為民間部門的個人或企業提供好處（一般是以換取政治支持）時，裙帶資本主義就會氾濫。與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備受指責的「貪婪」（greed）與「貪慾」（avarice）並非是市場資本主義的特徵，而是人之天性，影響著所有的經濟制度。

各國政府應採取如下四大方法，以扭轉資本主義的頹勢並縮小所得差距：

1. 拯救歐元與歐盟

歐盟對全球繁榮不可或缺。使用歐元的大國與仰賴歐盟繁榮的非歐元區國家，現在

需動用財力來拯救歐元。如果不如此做，未來的成本將更高。如果放棄歐元，財力有限的國家受害最深。

2. 補救美國政府債務與赤字問題

歐巴馬與國會須很快地拼湊一套可信度高的減債方案，否則後果將使世界難以承受，且也不利於資本主義。

3. 整合新興市場

世界須承認資本主義的重心正轉移至新興市場，那裡是 2012 年大部份成長發生之地；崛起後的中國、印度與巴西等國家，須整合到全球經濟決策的過程。

4. 教育

所得不平等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中小學教育落後。職缺與合格求職者間的媒合落差與日俱增，導致經濟活動減損、民眾普遍的不平等感及社會動盪不安。政府須擁抱改革，並有效配置資源；透過教育來降低高的中輟率及加強成人再教育與再訓練，國家將可有效地讓勞工擁抱新科技環境。

一、資本主義本身成為人們怪罪造成全球經濟危機元凶的新箭靶

當全球經濟危機邁向痛苦的第 4 個年頭之際，能被怪罪造成經濟衰退的元凶，幾乎都已被羅織殆盡：不負責的銀行家、貪婪的企業高層人士、無能的監理人員、爭吵不休的政客、薪資過低的中國勞工、薪資過高的希臘勞工、美國前總統 George W. Bush、美國聯準會主席 Ben Bernanke、德國總理 Angela Merkel、信評機構、歐元、揮霍無度的美國消費者。眼見新的一年仍可能深處逆境，且未見立即的解決之道，一個新箭靶已悄然浮現大眾心頭：資本主義本身。

怪罪資本主義的原因並不難理解。由於就業機會仍舊稀少、美國中產階級與歐洲家庭的福利日漸緊縮，現今的資本主義似乎沒有發揮它原本應該發揮的功能：對所有民眾提供經濟的機會和美好的未來。學校教導我們，資本主義會獎勵辛勤、有才能的人，然而，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資本主義似乎經常只對有人脈、有特權的人施惠。在很多人眼中，華爾街金融家仍舊不見改革、也不思悔改，他們仍然靠著那套將美國經濟置於險境的冒險把戲在致富；希臘、西班牙及葡萄牙等國政府藉由大幅刪減預算及調高稅負，以平息沒有耐心的債券持有人與銀行家，卻連帶使得民眾受苦；企業執行長們一面裁掉成千上萬的員工，一面把數百萬美元

的紅利放進口袋。

這股對資本主義不滿的情緒，遠比當前的經濟低迷還要嚴重。過去三十年來，隨著資本主義變得更為自由與更加全球化，富人得到巨大的利益，許多人的所得卻少得可憐。全世界各地的貧富差距幾乎都在擴大中。一篇發表於 2011 年對 OECD 會員國的研究報告指出，自從 1980 年代中期以來，22 個會員國的所得不均程度約增加 10%，其中的 17 國還在繼續惡化中。自由貿易所帶動的全球化，已造就出一個國際勞動市場，讓印度與美國的大學生同場競技，而把沒有競爭能力的人推到場外。美國與歐洲的工廠紛紛關門大吉，遷移到中國，造成西方失去數百萬個製造業的工作機會。

現在還保有飯碗的美國人，可從現今資本主義受惠的程度也遠不如他們的老闆。根據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的智庫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之報告發現，2010 年美國大企業執行長的平均收入是 1,080 萬美元，比前一年增加 28%；而一般勞工的平均年薪是 33,121 美元，僅增加 3%，執行長的薪水是員工的 325 倍。而在 1970 年代，執行長的薪水很少高於員工的 30 倍。參與佔領華爾街抗議運動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的 Kaylee Dedrick 表示：「很多人都說資本主義

沒用了」；「我們希望資本主義能創造更多機會，而不是讓權力只鞏固在一小撮人手裡，使得其他的美國人只能吶喊著『我們的那份到哪裡去了？』」。

當然，資本主義以前也曾遭到多次這樣的批評。馬克斯（Karl Marx）曾表示，資本

主義運作的真正方式是建立在壓迫之上。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期間，資本主義也成為民眾盯住的箭靶，他們認為，邪惡的銀行家透過未加監管的金融市場展開瘋狂的行動，並造成災難。

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病態的監管、政治及經濟間之交互影響力擴及各產業，產生的影響更為深遠

觸及改革當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流弊時，人們一直對監管的體系與廣泛性的失靈故意視而不見。的確，導致 2008 年全球經濟心臟病發作之病態的政治、監管及金融間之交互影響力（pathological political-regulatory-financial dynamic），已引發了眾多討論。但是，這個問題只是出現於金融業，還是代表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更深層的缺陷？

曾任 IMF 首席經濟學家的哈佛大學經濟及公共政策學教授 Kenneth Rogoff (2012) 指出，食品業有時會對民眾的營養與健康帶來有害之影響。肥胖率激增現已成為全球的問題，但在大國中，以美國最為嚴重。

Rogoff 討論食品業與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牽連較廣泛的若干問題，以及為何美國的政治體系甚少關心這個議題。Rogoff 指出，肥胖以各種方式影響壽命，從心血管疾病，到若干類型的癌症。此外，肥胖會影響生活品質。承受肥胖損失的不只是個人，同

樣也包括社會一直透過健康照護體系，或間接透過生產力的損失及運輸成本的增加等（如消耗更多航空燃料，座椅加大等）。

但肥胖的蔓延卻不像是經濟成長的殺手。含有大量化學添加劑的高度加工食品是體重增加的主要推手，但從傳統計算經濟成長的角度來看，它們卻是很棒的東西。大規模生產的農戶從種植玉米中獲利（通常由政府補貼），食品加工業則添加數以噸計的化學品，最終生產的產品讓人成癮，無法抗拒。在生產鏈中，科學家從研發適當的鹽、糖和化學添加劑之搭配比率，使新發明的速食食品最能讓人上癮，獲取報酬；廣告商從事推銷，獲取報酬；最後，健康照護業則從治療不可避免的疾病中，賺取財富。患有冠心病的資本主義（Coronary Capitalism）是股市的強心劑，股市包含了所有上述產業的公司。高度加工食品同樣有利於創造就業，其中也包括研發、廣告及健康照護等領域尖端

人才的就業機會。政客因為高就業、股價上漲，而再次當選，並從參與加工食品生產的行業獲得捐款。事實上，膽敢談論加工食品對健康、環境或永續性影響的美國從政者，常會發現自己獲得的競選捐贈非常匱乏。

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病態的監管、政治及經濟間之交互影響力 (pathological regulatory-political-economic dynamic) 擴及

各產業，產生的影響遠比促使上述食品業與金融業得到的冠心病，更為深遠。為保護社會的長遠利益，我們需要建立新的、更好的制度。

我們可以在一系列領域為民眾提供更確切的訊息，使人們能開始做出更加明智的消費選擇和政治決策，從而增進更健康的平衡。

三、為受到曲解的資本主義提出辯護

兩位任職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與社會研究中心 (Columbia University's Center for Capitalism and Society) 的教授 Phelps and Saifedean (2012) 指出，「資本主義」一詞意指一種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中，資本為私人擁有並交易；資本的所有者判斷資本的最佳用途，在做出判斷時，他們可以參考企業家與創新思想家的眼光和創新思維。此個人自由與責任的制度使得政府對經濟決策的影響空間很小：成功意謂獲利，失敗意謂損失。公司只有在自由的個人願意購買其產品的情況下才能存活，否則的話，就會很快倒閉。

19世紀，資本主義由於發展了獨特的創新能力而馳騁全世界。採用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獲得了無比的繁榮，普遍都能得到工作上的滿足，生產率的增長舉世矚目，結束了普遍貧困的現象。

如今，資本主義制度遭到曲解。人們開

始認為，在此制度之下，管理型國家 (managerial state) 有責任照顧一切，從中產階級的收入到大公司的盈利能力，以及產業升級，無所不包。但是，這樣的制度不是資本主義，而是一種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末期的俾斯麥 (Bismarck) 與 20 世紀的墨索里尼 (Mussolini) 執行的經濟管理 (economic order)：社團主義 (corporation)。

社團主義從多個角度扼殺了讓人振奮的工作、高速經濟增長、更大的機會和更好地融入經濟所需的動能。社團主義是無生氣、不節約、低效率、彼此盤根錯節的企業產生之溫床，而其代價則是有活力的新業者和外來者被阻擋在外。社團主義醉心於宣布目標，比如工業化、經濟發展、國家高於個人經濟自由和責任等等。如今，航空、汽車、農業、媒體、投資銀行、對沖基金和其他多個行業被認為非常重要，不能讓它們暴露在自由市場的競爭中，因此它們以「公共財」

之名領取著政府的援助。

社團主義的成本隨處可見：根本不能滿足客戶需求但仍然存活的低效率公司、產出增長緩慢的僵化經濟、令人乏味的工作、年輕人機會渺茫、為了掩蓋這些問題而最終走向破產的政府，以及財富向那些關係良好、站對陣營者的人們不斷集中。

這一權力從企業主和創新者向國家官僚的轉移，與資本主義是南轅北轍的。然而，社團主義的擁護者與既得利益者總是輕率地將其失敗之處歸咎於「魯莽的資本主義」和「監管缺失」，大談加強監督和監管一實際上便是企業和國家私相授受的代名詞。

前美國聯準會主席 Alan Greenspan (2012) 指出，那些對資本主義最感深惡痛絕的人士，對「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 與「自由市場」(free markets) 發生混淆。當政府領導人士常為民間部門的個人或企業提供好處（一般是為了換取政治支持）時，裙帶資本主義就會氾濫。然而，這不是資本主義，這應被稱為「腐敗」(corruption)。

與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備受指責的「貪

婪」(greed) 與「貪慾」(avarice) 並非是市場資本主義的特徵，而是人之天性，影響著所有的經濟制度。對所得不均度增加的擔憂是合理的，只不過它所反映的是全球化與創新的結果，而非源自於資本主義本身。

無論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存在著怎樣的缺陷，在曾被嘗試作為其代替的制度—從費邊社會主義 (Fabian socialism) (註 1) 到蘇聯模式的共產主義 (Soviet-style communism) — 沒有哪一種制度能夠成功圓滿地滿足人民的需求。資本家的行為確實需要調整。然而，在回應危機時，許多對資本主義模式的「改善」將制訂為法律，而在日後回顧這些「改善」是否明智，實令人擔心。

前美國財政部長暨哈佛大學教授 Lawrence Summers (2012) 指出，從日本到其他工業化國家，許多國家經濟成長停滯、失業率飆升，令人質疑資本主義之促進就業與提高廣大中產階級生活水準的效能。但是，這是否反映資本主義的固有缺陷，抑或是 Keynes 所提及的「發電機」問題(註 2)？Keynes 認為，「發電機」問題可以透過適當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來解決，但對大規模

(註 1) 費邊社會主義為英國費邊社 (Fabian Society) 所倡導的一種民主社會主義學派。1884 年成立於倫敦的費邊社，係由少數具有社會理想的青年知識分子所組成，重要的代表人物有：韋伯夫婦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華萊士 (Graham Wallas)。費邊主義者的信念認為，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實現，是一個漸進而必然的轉變過程。他們排斥馬克思階級鬥爭及激烈革命的觀點，改採民主溫和的方式，企圖以國家做為推動改革的工具，主張廢止土地私有制、工業國有化，以及實現各種社會福利。

(註 2) Keynes 在 1930 年 12 月所發表的一篇題為《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Slump of 1930) 之文章中寫道，「我們有『發電機』問題，那麼我們如何可以重新發動呢？」(We have “magneto” trouble. How, then, can we start up again?)。他將 1930 年經濟大蕭條的經濟停滯比擬作汽車的發動機故障。

的結構性措施卻無效。

結果，證據一面倒地支持後者。如果適當調整總體經濟政策，目前多數的難題都將消失。至於改革資本主義的努力，則可能會偏向不採取促進需求的必要措施，而未能促進人們就業。

對資本主義不需失望，因為失業人口急劇增加與貧富不均，主要係與科技進步有關。技術進步讓糧食需求可以只仰仗人口的一小部分來滿足，因而向農業以外的行業釋出大量的勞動力。目前很多的製造業與服務

業正在經歷相同的進程，使得就業機會大幅減少。與此同時，如同工業化時代的早期，嚴重的資源錯配，加上大量生產的能力提高，使得少數幸運兒獲取極大的財富。

英國財政大臣 George Osborne (2012) 則認為，我們正在經歷的是一場質疑西方民主國家是否有能力實施果斷的領導，提高民眾生活水準的信任危機；而非是一場資本主義的危機。我們現在必須做的是擴大自由市場原則，而不是為既得利益提供舒適的保護傘。

四、資本主義在人類的歷史中有其成功的一面，但當前亟需改革

歷史的發展顯示，資本主義打敗它的主要競爭對手——共產主義——已吸引了全球愈來愈多的人加入資本主義生氣蓬勃的軌道。箇中原因是因為在人類的歷史中，沒有其他的經濟制度可以證明，能夠比資本主義更快速地創造財富與發展。

根據已故的統計專家 Angus Maddison 之估算，公元元年之後最初的 1,820 年期間，全球 GDP 增加了 7 倍；然而，其後由現代資本主義主宰約 200 年的期間，全球 GDP 增加逾 70 倍。資本主義已大規模地根除貧窮、推動在醫藥、資訊及運輸方面的創新；並透過貿易與金融將全球緊密結合。

Schuman (2012) 指出，資本主義能夠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絕不會停留在靜態。它之所以能夠存活並繁榮，是因為它曾一次又一次地改革，對當時的病症做出回應。經濟大蕭條造成的痛苦激發了促進資本主義公平與穩定的運動，導致政府更大的保護貿易與管制——美國的新政（New Deal）與歐洲的福利國（welfare state）。然後，為了克服 1970 年代的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資本主義須更具生產力與創新。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引導解除管制、自由貿易及自由資本移動的時代，產生全球經濟的

(註 2) Keynes 在 1930 年 12 月所發表的一篇題為《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Slump of 1930）之文章中寫道，「我們有『發電機』問題，那麼我們如何可以重新發動呢？」（We have “magneto” trouble. How, then, can we start up again?）。他將 1930 年經濟大蕭條的經濟停滯比擬作汽車的發動機故障。

榮景。當今，在經濟衰退延續不去的情形下，資本主義已到達另一個轉捩點。全球的金融部門仍是如此的不健全，施加於一般家

庭的痛苦是如此的巨大，資本主義需要再次改革，變得更為包容、平衡且較不容易造成崩潰的反覆發生。

五、如何改革資本主義？

就如何改革資本主義，並無一致性的看法。解決之道，應是更新政府的角色，來控制資本主義若干最糟的無節制之處。

Schuman (2012) 提及，一位參與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人士 Mark Bray 表示，更嚴格的監管銀行應列為優先。一位任職於政策研究所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所得不均問題的專家 Chuck Collins 則贊成賦稅改革，提高對最富有人土的課稅，並終止海外避稅的濫用；制訂新的公司法規，提升勞工與團體對公司管理的影響力；並限制大企業對融資與遊說政客的能力。

但是，在債務與赤字膨脹的情形下，工業化世界的各國政府被迫削減保護窮人的社會福利支出。債務也對政客施壓，要讓資本主義更加自由—解除對企業所有權移轉的障礙，並放寬對勞動市場的保護—以提升它們的經濟競爭力。

有些人則認為，全球經濟災難並非是資本主義的失敗所造成，而是政府的失敗所造成：監理機構漠視銀行的輕忽風險，然後當它們具風險的行為形成對經濟穩定的威脅時，卻去救援它們。藉由提供華爾街取得容

易的紓困資金，讓銀行家以很少的代價轉虧為盈。這樣的作法造成政府阻撓了資本主義自我管制的本能 (self-regulating nature)。香港經濟諮詢公司 Asianomics 的創辦人 Jim Walker 說：「讓銀行家負責的唯一之道是讓他們倒閉」；「資本主義並未犯下不公正的罪過；而錯誤的政府政策卻犯了此罪」。整頓此問題的方法是更多的資本主義：只有更自由的市場能夠確保做錯的人虧損，且做得好的人成為贏家。Walker 說：「資本主義不會給失敗者重蹈覆轍的機會」。

政府官員與中央銀行家並非是防止金融危機的唯一失敗者。股東、董事會董事、會計人員及其他負責監控風險與公司行為的機構也沒有盡到責任。

當西方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變為沈淪之時，中國、印度及其他若干快速提昇的新興世界，卻因資本主義而富有，在邁向富有的過程中，它們緩慢、堅定地轉向更加自由的貿易、解除管制，並更加開放資本流動。全球的政治家、經濟學家、銀行家及公司領導人面對的挑戰是在緩和全球化與貪婪的負面效果之同時，以增進成長的力

道，並推升受壓抑人群的方式，來改革資本主義。改革的結果將對下一代塑造出資本主義與世界經濟的命運。

私募基金巨擘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執行長 Rubenstein (2012) 指出，資本主義存在財富創造沒有節制及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之兩大缺失，沒有簡單的矯治方法；但欲扭轉這套體制的頽勢，各國政府該有所作為。

沒有節制的財富創造將製造難以持續的榮景，最後便是無可避免的崩潰。廉價信用（cheap credit）引發的大衰退，正是這個缺陷的典範；而追求財富的同時，許多富裕國家的貧富差距，已達到極為嚴重的程度。

各國政府應採取如下四大方法，以扭轉資本主義的頽勢並縮小所得差距：

1. 拯救歐元與歐盟

歐盟對全球繁榮不可或缺。使用歐元的大國與仰賴歐盟繁榮的非歐元區國家，現在需動用財力來拯救歐元。如果不如此做，未來的成本將更高。如果放棄歐元，財力有限的國家受害最深。

2. 補救美國政府債務與赤字問題

歐巴馬與國會須很快地拼湊一套可信度高的減債方案，否則後果將使世界難以承受，且也不利於資本主義。

3. 整合新興市場

世界須承認資本主義的重心正轉移至新興市場，那裡是 2012 年大部份成長發生之地；崛起後的中國、印度與巴西等國家，須整合到全球經濟決策的過程。

4. 教育

所得不平等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中小學教育落後。職缺與合格求職者間的媒合落差與日俱增，導致經濟活動減損、民眾普遍的不平等感及社會動盪不安。要解決這些問題，政府須擁抱改革，並有效配置資源；透過教育來降低高中輟學率及加強成人再教育與再訓練，國家將可有效地讓勞工擁抱新科技環境。

Summers (2012) 則指出，目前亟須進行改革的領域，並非現代經濟社會裏資本主義色彩較濃厚的領域，而是資本主義介入程度較低的部分，亦即醫療、教育等領域。

參考文獻

- Greenspan, Alan (2012), "Meddle with the Market at Your Peril," *Financial Times*, Jan. 25.
- Osborne, George (2012), "It's a Crisis of Confidence, Not of Capitalism," *Financial Times*, Jan. 27.
- Phelps, Edmund S. and Saifedean Ammous (2012), "Blaming Capitalism for Corporatism," *Project Syndicate*, Jan. 31.
- Rogoff, Kenneth (2012), "Coronary Capitalism," *Project Syndicate*, Feb. 1.
- Rubenstein, David (2012), "A letter to Capitalists from Adam Smith," *Financial Times*, Jan. 9.
- Schuman, Michael (2012), "How to Save Capitalism," *Time*, Jan. 19.

Summers, Lawrence (2012), "Current Woes Call for Smart Reinvention not Destruction," *Financial Times*, Jan. 8.

(本文完稿於 101 年 3 月，作者鍾世靜先生、朱美智小姐現為本行網路金融資訊工作小組二等專員，吳黃蘋小姐則為同小組辦事員。)